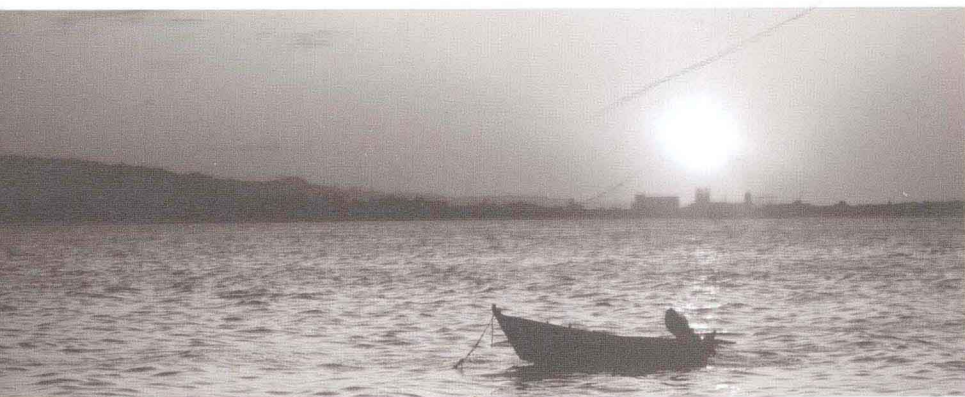


Political Man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郭为桂 林娜 译

Political Man



鳳文庫

政治學前沿系列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郭为桂 林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美)李普塞特
(Lipset, S. M.)著;郭为桂,林娜译. —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2013.9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784-3

I. ①政… II. ①李… ②郭… ③林… III. ①政治社
会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6586号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pyright © 1959, 1960, 1981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49

书 名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著 者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译 者 郭为桂 林 娜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5.75 插图4

字 数 405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784-3

定 价 43.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 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戴维、丹尼尔和卡罗拉

译者的话

现代性的展开不仅是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人心秩序的重构过程。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社会历史变迁进程的表里两面。这一进程所展示出的大规模的危机、冲突、斗争甚至战争，不仅是社会结构失衡的表现，更是人类心理结构失衡的表现。这种失衡引发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的人群的不同反应。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正是这些不同反应在意识形态上不同的系统化表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是这些不同反应各自在社会政治制度形态上的实践性方案。借助现代强大的传媒、交通和组织技术，林林总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程度不同地决定和影响了几所有人的命运。古代那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然人”闲适的生存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治人”是现代人的宿命。

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以下称《政治人》）探析的正是现代人在追求民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宿命。在广泛搜罗整理并比较各种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李普塞特力图用科学数据证明，现代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是“更普遍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成熟，有赖于人们对更广泛的源于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的、观念的、习俗的、心理的等层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冲突的不断调适，在变

化中寻找自己的在世位置,在冲突中寻找共识,在调适中寻求安全感和平衡感,获得中道理性。举凡偏离中道理性的各种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等,正是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严重失调的表现。某种意义上,现代政治过程就是在一致与冲突、共识与分歧之间寻求平衡点的过程。没有共识,就没有民主。对于民主政治的维系来说,这种共识不是舆论一律,更不是组织盲从,而是一种体现在“女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观念之中的政治文化。一个人可以反对政府或者当权者,但是不反对该政治体系所承载的社会最基本价值观的行为规则,这正是约翰·罗尔斯在复杂现代性背景之下所要寻求的“重叠共识”: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价值观不同的人从各自角度出发或通过采纳彼此视角而支持共同的规范;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未来的彼此理解乃至“视域融合”。(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06期。)一句话,最低限度的规则共识是维系民主的前提。

但是,正如欧洲宪政主义思想史上那种风行久远的观念,李普塞特更看重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冲突和分歧,“稳定的民主要求凸显冲突或者分歧,这样才会有围绕着统治地位的斗争,才会有对当权派的挑战,才会有政权的更替”。李普塞特在另一本书里说得更直白,“作为一个被冲突理论家说成是所谓的一致学派的追随者并受到批评的人,我乐意指出我的政治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探讨的是冲突和变革,而不是一致和整合。”(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导言,第1页。)当然,李普塞特并不是为冲突而冲突——他批评马克思“把冲突与共识看做是非此即彼的东西,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但存在被平衡可能性的趋势”——而是认为一定限度的冲突有利于维护民主的运转。换言之,规则共识范围内的冲突是民主政治的生命力所系。“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一种民主的秩序之所以不可能被推翻,其原因正是在于它承认冲突是合法的和必要的,并使它的公民有机会参加和支持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斗争的组织。”(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导言,第6页。)李普塞特借用马克思的术语,将现代

政治运行的机理称为“民主的阶级斗争”，其要义是，在政治权力的竞逐中，选票(ballot)代替了子弹(bullet)，理性算计代替了暴力革命。

李普塞特正是在“共识—分歧”的思维框架下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的。在他看来，促成民主共识的根源和导致民主冲突的根源都在社会之中——这正是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成立的前提。那么，哪些社会条件有助于促成民主的共识呢？李普塞特用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经济发展、教育、有序的社会流动、自由结社等社会发展的要素是民主成长和成熟的必备条件。这些要素给人们带来富足的生活、安全感、开阔的视野、开明的心智、理性的算计能力、妥协的艺术等等；所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民主人”的特质，都是社会给予民主政治发展的“正能量”。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李普塞特并不像韦伯和米歇尔斯那样，担忧现代社会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其内在的“寡头统治铁律”对民主政治的伤害。“对日益增长的官僚化给民主与自由带来的最终影响，韦伯十分悲观。与托克维尔一样，他担心巨型国家的发展最终将摧毁正当程序与法治。在韦伯那里，社会主义意味着官僚权威向全社会扩散，它导致‘官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韦伯和米歇尔斯所担忧的现代科层官僚制弊害的地方，李普塞特看到了其助推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他说：“大型组织的发展可能带来更重要的后果，它为持续的自由和更多的创新机会提供新的来源。官僚化(加上其他因素)对于那些掌权者而言意味着专断权力的减少。通过建立公正平等的准则，通过减少许多非官僚组织领导人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官僚制可能意味着更少需要服从上级，而不是更多。”在自由民主的语境之下，科层官僚制不仅是现代大型复杂社会的必需品，而且是防备政治专权的防腐剂，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粘合剂。对此，李普塞特用一个篇幅颇大的章节讨论了工会的寡头制问题。其结论是，民间组织内部的民主，并非更大社会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它们有时会削弱文明社会的民主进程。相反地，“工会，像许多其他内部实行寡头统治的组织一样，有助于维持更大的政治体的政治民主。”

另一方面,“低教育程度,很少参与政治或者任何类型的志愿组织,不爱阅读,与世隔绝的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以及专断的家庭模式,”这些滋长于不同社会境况的“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习性,以及由此塑造的李普塞特所谓的“权威主义性格”——不宽容、不妥协、固执、排外、走极端等等——都让现代政治偏离了民主轨道,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运动。毫不奇怪,李普塞特首先将权威主义性格主要分配在下层阶级身上,并且用社会调查数据证明这一点:“来自多个国家的民意测验数据表明,下层阶级比起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来说,对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要淡漠得多。”同时,下层阶级“将政治看做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比起其他阶层都更喜欢激进主义运动,这些运动提议用简洁明快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其观点坚定执着。”那么,作为亚里士多德眼中民主政治稳健运转之理想社会结构的中产阶级,是不是就对民主规则一体遵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代史上对民主政治最大威胁之一的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当中,中产阶级就占了很重要的一席。许多国家的数据都表明,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李普塞特在书中分析了多种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运动,法西斯政党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了超大比例的支持。为什么呢?面对“集中的、大规模的企业的出现以及有组织的劳动者的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地位的挤压……小企业主、小农场主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中缺乏安全感的人士特别容易受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鼓动,后者既反对大劳工,也反对大资本。”归根结底,不论是下层阶级的极端主义还是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根源都在于前述对现代性状况不适的一种心理反应。“极端主义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迎合社会各阶层中心怀不满及心理上无家可归的人,迎合个人事业上失败、受社会孤立、经济上无保障、未受过教育、不成熟的人以及极权主义信奉者。”

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就是民主力量战胜导致严重冲突乃至流血战争的各种极端主义的过程,更是消除极端主义之社会根源的过程。从欧美多数国家来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期到20

世纪中叶(学界也有人因此把这个时段界定为“现代”)。李普塞特所考察的“政治人”,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他是在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某种程度上,《政治人》一书及时勾勒了现代政治急剧演进的“全景图”,它从历史和实证层面考察并解释了现代民主政治延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及其根源,对于人们理解民主的生成及其运行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正如李普塞特在1981年的再版序言中所说的,“尽管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研究素材已经过时,但本书对比较政治行为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对于1980年代那些对政治学感兴趣的读者而言,并没有失去参考价值。”也因此,《政治人》忝列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行列,长期畅销并被广泛征引——自从1960年出版以来,它已被翻译成20种语言;到2006年李普塞特去世的时候,它一共售出400000多册;它也是被引用最多的现代政治学著作之一。

当然,阅读这本学术著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看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最吊诡的是,《政治人》被一些人看做自由民主的捍卫书,被另一些人看做自由民主的批判书。对此,李普塞特不得不借1981年再版的机会,花了很大篇幅来呼应各种评论对他的误读。这些误读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现代社会政治局面的复杂性——很难简单地用某个标签囊括某种社会政治现象,而对复杂社会的解读,如果没有开阔而精致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功底,断难窥其全豹并说服人。李普塞特在书中展示了开阔而精微的学术洞察力,在如山的资料面前,在纷扰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实践中,他以抽丝剥茧的功力,梳理出种种政治行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异同点及其社会经济根源。他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分析、对法西斯主义各种版本的解读、对美国选举政治中各个群体的表现、对美国知识分子政治的解剖,在在展示了这种理论洞察力。

当然,人们的种种误读,也跟李普塞特本人思想的复杂性有关。李普塞特一生著作等身,一共写了21本书,编辑了25本书,还写了几百篇学术论文。作为出生于美国(1922年3月18日)的俄裔犹太移民二代,

他对当代政治社会的激烈变动保持着高度的敏感,用他跨越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视角,研究涉猎了自己所生活时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层面。正因为这样,他的思想演变轨迹难以厘清。在大学时代,他是典型的左派分子,在 1930 年代末 1940 年代初参加了“托洛茨基派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Trotskyite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参加这个流派的还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社会文化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政治记者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和欧文·克里斯托弗(Irving Kristol)等人。到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这批人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向右转。事实上,他们集体被认为是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军人物。《泰晤士报》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李普塞特逝世时所发表的纪念文章的导语,就称他是“多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他对自由民主的研究塑造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对于这一思想的或者政治的标签,李普塞特并不认可。他仍把自己看做一个左派分子,并经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

不管对李普塞特的学术人生如何定位,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是一位坚定的美国爱国者,是美国例外主义的首席辩护士。李普塞特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北美规则独特性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发表于 1950 年的《农业社会主义》(*Agrarian Socialism*),内容是加拿大农业省萨斯喀彻温的“社会信用运动”(Social Credit Movement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 of Saskatchewan)。在长期的工作中,他一直关注加拿大的变化,把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作为选择不同道路的试验场。他在出版于 1990 年的《大陆的分隔》(*Continental Divide*)一书里比较了美国和加拿大。历史学家迪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总结李普塞特一生的成就时说过,李普塞特是托克维尔的 20 世纪传人,他的贡献在于“向美国解释美国”。他的一系列著作解释了美国的独特之处,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为什么在美国思想界和政界形不成气候”这样的宏大问题。在 1996 年出版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

书中,他总结道:“我把美国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政体看做双刃剑,社会的许多负面特点,比如收入不均、高犯罪率、低投票率、强大的道德感而有时引起对政治和伦理少数派的不宽容,都和一个让人倾慕的开放民主社会里的沿革和特性有联系。”他认识到民主政府的成功不但依赖于制度设计,还依赖于伟大的领袖——而美国在这点上格外幸运。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深化期,也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地、大量地涌现。参照李普塞特的观点,这正是国人在利益格局调整面前进行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调适的时候。新的社会局面,显然需要政治发挥更加明确更加合理的导引作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任务也因此更显紧迫。在此背景之下,学习、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在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显得尤为必要。李普塞特这本书对此给出的答案,不仅是相关学科专业人士必备的智识资源,而且对社会各界人士亦不无参照价值。它至少昭示着,培养宽容、理性、妥协的政治人品格,消除各种极端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是多么地重要!当然,正如美国例外主义一样,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除了遵循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适公理之外,还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做出合理的安排。相信有兴趣阅读此书的读者诸君,对于这一持论不会有什么异议。此外,书中的某些论点,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都合理,也相信读者诸君有足够的辨别力。

翻译本书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三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时,我是很犹豫的。这本书在大陆已经有两个中文版——一是商务印书馆 1993 年出版的,译本依据的是 1960 年英文版,译者是刘刚敏和聂蓉;另一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译本依据的是 1981 年的英文版,译者张绍宗——有必要再翻译一次吗?自己能超越前人吗?编辑用以下三点理由说服了我。一者,鉴于本书的经典学术地位,中国政治学学科及著作的规范化发展需要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版本;二者,商务版的译本依据的不是最终产品,上海人民版的译

者出国联系不上,修订译本无法落实,需要找合适的而且不辞辛劳的人来翻译;三者,从我在江苏人民社所出版的两本译著的质量和我本人的治学背景看,相信能够胜任。其实,犹豫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深知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三年来各种工作任务和生活压力接踵而至,让这项工作苦上加苦。诸事缠身之下,翻译时断时续,交稿日期也一拖再拖。好在出版社方面宅心宽厚,虽有催促但也对我的延宕表示理解和宽容。转眼间出版社与外方签订的版权协议即将到期,于是在完成各项工作之余,加班加点,总算在国庆放假期间完成了全部书稿的清样校对。至于译本质量如何,只好交给读者诸君判断了。

郭为桂

2012年10月3日于福州·木曰斋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和民主秩序的条件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1129)

“所有的人天生都赋有一种社会本能,不过最先缔造城邦的人是最伟大的恩主。人在完美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动物,一旦背离了法律和正义,就是所有动物中最糟糕的一类;因为武装起来(armed)的不义是最危险的,而人诞生伊始恰恰就具有各种装备^①,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能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未尝不会被用于最邪恶的目的。故而,倘若人没有善德,他就是最邪恶最野蛮的动物,也是最淫荡最贪婪的动物。不过,正义是城邦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因为正义的实施,亦即决定什么是公正的,乃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原则。”(1130)

“群体中任何一位成员,如果孤立起来,当然比智者卑微。鉴于一场所有宾客合力参与办理的宴会要比单独一个人办理的宴会更好,因此群体比之于单个人在判断许多事情上更胜一筹。再者,多数人比之于少数人更不容易腐败;这好比大量的水相对于少量的水而言,更不容易变质。”(1200)

“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公民构成的,也即

^① arms 此处指人体的各种机能,如拳脚和言语等。——译者

共同体中的中产阶级占多数,城邦事务很可能因此管理得井然有序……所以,公民丰衣足食,都过着小康的生活,实在是城邦的大幸;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万贯,有些人一贫如洗,就会各趋极端,要么是绝对的民主政体,要么是纯粹的寡头政体;要么,由最猖獗的民主政体或者最猖獗的寡头政体,生发出僭主政体;而由中道的或者类似中道的政体,却不太可能生发出僭主政体……相对来说,民主政体比寡头政体更持久,也更安全,因为它们的中产阶级数量更多,他们对政事也更有发言权;一旦民主政体缺乏中产阶级,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城邦就会随之而解体。”(1221—1222)

“在法治得到伸张的民主政体中,最好的公民占据头等位置,也没有蛊惑民心的煽动家的容身之地;如若不然,法律不是最高准绳,煽动家便会乘机作势。因为人民成为统治者,多数人合而为一;多数大权在握,不是单个地而是集体地行使权力……无论如何,此类民主政体,就蜕变成了民主制,不再受法律的规制,力求君主般的统治地位;阿谀奉承者得享尊荣。”(1212)

“存在如此多政体类型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城邦都包含了许多成分。首先,我们看到所有的城邦都由众多家庭构成,而且在公民群体中,势必有人富有人穷,还有一些在中间……在普通人当中,有农夫,有商人,有工匠,显贵之中也有财富和家资的分化……显贵之间除了财富的差异,还有名望之别,才德之分……很明显,势必有多种多样的政体,类型分殊,因为参与治理的公民成分不同,各自的政体类型就各异。一个政体就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所有的公民团体,要么按照不同阶级如富人或穷人所拥有的权能,要么按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某种平等原则,在其内部分配公职。”(1208)

“引发革命情绪的……普遍而首要的原因……[是]对平等的渴望,就是人们认为那些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跟自己是平等的;或者是对不平等和优越感的渴望,就是这些人自认为比那些卑贱者优越,但自己所拥有的跟他们相当,甚至还不如他们……果真如此,那么在寡头政体中,群

众就会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观念激发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平等的,却没有同等的待遇;而在民主政体中,贵族就会起来反叛,因为他们是不平等的,却享有同等的待遇。”(1236—1237)

引文来自 Benjamin Jowett 翻译的“Politica”,刊载于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 1941)。